

徬徨英雄路

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余杰◎著

徬徨英雄路

—— 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余杰 著

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2009年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 發	者 行	余 林	載	杰 爵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叢書主編	沙	淑	芬
地 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校 對	蔡	耀	緯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4樓	封面設計	蔡	婕	岑
叢書主編電話	(02) 27634300 轉 5226				
總 經 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台北忠孝門市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話	(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高雄辦事處	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2樓				
電話	(07) 221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276837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78-957-08-3383-6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序一

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

去年夏天，我有幸讀到余杰的近著《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這是一本討論近現代思想與文化發展的論文集，裡面穿插著作者對現代文學史與現代報刊初建的研究，內容極為豐富。令我特別有興趣的是：作者與我在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上有著一些共同的問題與視野。這使我在讀這本書時，不但常常產生共鳴，同時也給我帶來一份空谷足音的驚喜。

這本書使我產生思想共鳴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余杰在書中強調：近現代思想文化的劇變主要是發軔於由戊戌到五四這一段時期。這也是我近些年來的一個基本看法。如今讀了余杰這部書，更增強我對這看法的信心。我相信說明一下這個看法的思想背景，更會幫助讀者體會此書的價值與意義。

大致而言，強調由戊戌到五四這段時期在近現代思想文化轉型中的關鍵性這個觀點，是針對時下流行的兩種看法而提出的。一個是「五四本位」的看法。長久以來，在國內和海外，學者常常認為近現代思想文化的劇變是由五四時代開始。但近些年來的學術研究使我們越來越質疑這種「五四本位」的看法。首先，新文化運動是由近現代的雙重危機激發起來的。所謂「雙重危機」，是指空前的政治次序危機與文化思想危機。認識這「雙重危機」的來由與性格，是了解五四的一個必要條件。但要滿足這必要條件，不能只看五四這個時代，必需上溯至由1895年開端的戊戌時代。因為這「雙重危機」是在由1895

年至五四時代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出現和定型的。其次，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幾個主題思想，如民主、自由、科學、極端反傳統主義以及政治激化與白話文學，都經過長期的醞釀，都必需在綜覽1895年以後三十年的歷史劇變的前提下，才能對這些五四主題思想的發展作深入的認識。

總之，「五四本位」的看法可議之處甚多，此處無法深論，僅就上面提出的兩點而言，即可看出，近現代的思想文化轉型，並非孤峰突起於五四時代，而是突破於由甲午到五四長期積累的思想演化。

除了「五四本位」的觀點之外，近年來尚有一個很普遍的趨勢，把近代思想轉型的時間往前推，推到16、17世紀，也就是晚明清初的時代。學界持此看法的人甚多。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就是其中鼓吹最力的人。

就思想文化發展而言，明末清初之重要性，幾乎是今日學界之共識。但這些重要的發展是否可定位為轉型的變化？我認為這問題端賴如何認識思想轉型，需要在此稍作釐清。在我看來，思想轉型必需有兩面：質的一面與量的一面。也即不但思想內容要有轉型的變化，同時這變化必需能夠在社會上大規模地、持久地擴散出去。

什麼是思想內容的轉型變化？大致說來，這是指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解體，以及隨之而來的基本價值與知識的轉變。晚明清初有沒有這種轉型的變化？那就要看看當時中國文化傳統的主流——儒家思想的發展情形。大致而言，儒家思想傳統發展到明清時代，它的核心結構是由一組特定的基本價值與宇宙觀的結合。更具體的說，就是以儒家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價值觀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的結合。同時，儒家這套核心思想經過唐宋以來長時期的擴散，在明清時代業已滲透到儒家以外的兩個宗教傳承——佛教與道教。換言之，這套核心思想多少已經變成中國文化傳統的三個主要傳承所共認的基本觀念。現在就要問：在16、17世紀的明清之際，這套思想是否已有解體的趨勢？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需看明清之際的新思想發展對正統儒學有什麼樣的衝擊？首先是西方的衝擊。由耶穌會帶進來的基督教義與科技，在當時曾引起一些士大夫的注意。因此，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但耶穌會教士在傳播基督教與西學的時候，大致採取一種緩和妥協的態度，見之於他們提出的「天儒同理」的主張，而把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佛教，遂有「補儒易佛」的口號。因此，大約而言，西學的傳入對當時思想界與學術界注入一些新的成分，但震盪不大，更談不上對儒學的核心思想產生突破。

更重要的是，由晚明到清初，儒家傳統內部變化所產生的激盪。此處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王陽明學派所引發的一些激進思想，反映於所謂的左派王學與泰州學派的出現。他們認為儒家聖人之學的重點在於「心即理」與「致良知」這些觀念，也即強調個人內在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因而時有產生激進的批判意識的趨勢。這一發展在當時又與新興的唯氣論匯合。後者攻擊儒家主流的理氣二元論，連帶針砭程朱正統學派的理欲二元對立的觀點，從而認情欲與私利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因此，對儒學主流的禁欲主義與權威主義提出質疑與批判，對當時的文化與思想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不可忽略的是，明清之際的激進思潮在儒學內部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動與圍堵，以致在17世紀末葉以後，這些激流多半已不見餘響了。

此外，針對宋明理學主流的修身學以及隨之而來的內省靜觀的趨勢，明清之際的思想界也出現了一些反彈的變化，那就是強調儒家思想中的政治社會意識，引發經世觀念在儒學中復甦。這種趨勢大約有兩面：一面是士大夫為了進行政治社會活動，而結社組黨，造成中國傳統文化中別開生面的一頁。同時，儒學傳統中也出現一些對政治權力安排的深刻反思。如顧亭林透過郡縣與封建制度的討論而思考如何分配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問題；甚且如黃宗羲，追根到底，以公私對比的道德觀以及強調君師二元權威分立這些觀點去質疑與挑戰傳統皇權

體制的思想基礎。

正如我前面討論的其他幾個明末清初新的文化思想趨向，經世思想的批判意識發展下去，有突破儒家主流的核心觀念的潛勢。但這方面的趨向，與其他幾個趨向一樣，都未能充分發展其潛勢。總之，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不能誇大明清之際的新思潮的影響。一則因為，這些新趨向所產生的思想衝擊都未能達到一種深度與強度，可以在基礎上撼動儒家主流的核心思想。其次，就這些新思潮影響的廣度而言，它們多局限於當時某些學術流派或某些地域的學者士大夫，未能真正擴散出去造成廣泛的社會文化震撼。再其次，就其影響的時間性而言，這些新思潮都只能在明清之際的兩個世紀間發生一些或久或暫的沖激；也就是說，它們在17世紀末葉以後幾乎都已變成強弩之末，而逐漸式微消退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明清之際的思想變化，雖然重要，但並未能突破傳統而產生文化轉型。這轉型要等到19世紀西方文化第二次衝擊中國時才發生。此處我要強調的是：這第二次西方衝擊開始於19世紀初葉，鴉片戰爭前後，但開始以後劇變並未立刻展開，而是要再等半個世紀，到甲午戰爭以後的二、三十年，傳統文化才真正開始解體，文化轉型才真正湧現。理由大致可從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在甲午戰爭以前的五十年，西學的散布限於政府少數的辦理洋務的官員以及沿海沿江幾個大城市裡的「邊緣人」，如商賈買辦及教會人士等，並未深入中國社會主流——士紳階級的思想世界。同樣重要的是：當時西學的流傳，不但廣度很不夠，而且在少數受西學影響的朝野人士的圈子裡，其影響的深度也很有限。他們大致認為西學只有工具性與技術性的價值，至於基本政治社會體制與價值規範，則仍以傳統儒家核心思想為主導。這就是當時以「中體西用」觀念為標誌的主流態度。

1895年以後，變化情形大為改觀，從余杰書中的論文，讀者不難看到：思想文化的變化，無論就廣度與深度而言，都有空前的突破，

同時也多方面開啓了未來的新機，爲後來的五四奠基鋪路。放在這樣一思想發展的大脈絡中去看，他強調戊戌到五四是中國近現代文化轉型的關鍵時期自是不爭之論。

讀這本書另一個使我感到共鳴的地方，是余杰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討論，見之於他書中的長文——〈從士大夫到知識分子〉。其實縱覽全書，我們不難發現，書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從思想史、文學史、報業史等各種不同的角度，直接間接地去認識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說知識分子是此書的研究主題也不爲過。

關於這個主題，我覺得此書有三個特色，值得在此指出。首先，作者把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放在一個文化與歷史的比較視野裡去看。例如，一方面他以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發展爲借鑑，看到西方大學制度在中世紀末與近世初期出現，是西方近代知識階層興起的一個重要支柱。同時，他也以中國傳統士大夫作爲了解近代知識分子的背景，看到傳統科舉制度與士大夫階層之間的密切關係，透過一番中西古今的對照，他才能指出1895年以後科舉制度的式微與大學制度的建立是近代知識分子問世的一個重要條件。我並不完全同意他作文化與歷史比較所涉及的一些具體論述，但他書中所展現的比較視野，毫無疑問替知識分子的研究提示了一個正確的方向。

這本書中最長的一篇論文，幾乎占全書五分之二的篇幅，是作者對中國近代早期報紙《知新報》所作的研究。這篇長文使我們看到近代報刊的興起與新知識分子的出現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展現了余杰研究知識分子的另一特色。

此處必需指出的是：中國在戊戌時代以前，報刊已經出現，但數量極爲有限，而且多半是「邊緣人」，如商人與傳教士辦的。前者主要傳布商業市場的資訊，後者主要報導教會的訊息。少數幾家綜合性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等，因爲主辦人不是來自社會主流的士紳階層，影響未能廣爲擴散。但是，1895年以後，來自士紳階層

的知識分子開始創辦一些新型報刊，針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時事演變發言，立刻使報紙銷路與影響遽增。《知新報》就是這種新型報刊的一個先鋒，在當時的聲勢與影響，如余杰指出，僅次於《時務報》。

關於這種新型報紙，中外學界歷年來出版了不少綜合研究，但是對於個別重要報刊的研究，像余杰對《知新報》作的那樣精細深入的個案分析，則甚少見。

透過余杰的分析，我們看到了《知新報》以及它所代表的新型報紙替中國報刊帶來的一些空前的變化。例如他指出《知新報》反映了一種嶄新的「報刊意識」，認為報紙負有一種新的時代使命：開民智以促進國家富強；向政府建言提供新的觀念，並從事監督；同時也表達民意，開始顯露主權在民的意識。

更重要的是：這種新型報刊對於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社會所發生的長遠影響，余杰是從三個方面去剖析這些影響的。首先，他認為新型報紙是散播外來的新知識的媒體。其次，他看到在《知新報》裡出現了一種他稱之為「新舊交替」的文體與詩體。它們可以說是由傳統舊文學到現代新文學的過渡。再者，他指出新型報刊與近代社會的另一個重要的新發展有著密切關係：那就是戊戌時代開始在傳統以官僚體制與家族為主軸的社會之外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空間，可以供給一般受教育的人從事廣泛討論公共事務與政治社會問題以及其他社會文化活動。這種「公共空間」當然也是近代知識分子主要發揮影響的場所。總之，我認為余杰這本書透露了中國近現代歷史一個很重要的消息：1895年以後登上歷史舞台的近代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型的知識分子有著一個很大的不同。後者在社會上的核心地位在於他們與以皇權與官僚體制為基礎的現實權力中心有著緊密的聯繫。在1895年以後，隨著科舉制度以及其他傳統的聯繫機制逐漸式微與消解，知識分子與現實權力中心自然發生疏離、隔閡，甚至矛盾、抵觸，但這並不意謂知識分子失去他們在現代社會的核心地位。因為隨著舊的制度式

微與瓦解，社會組織上出現一些新生事物，如余杰指出的新型報刊與公私學校以及各種類型的社團與政黨組織。現代知識分子憑藉這些新的文化媒體與社會組織，一方面可以掌控輿論，左右時代思潮；另一方面也可以發動大規模的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變成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主要動力，其地位與影響較之傳統士大夫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余杰研究知識分子，提出一些他治史的觀點，很值得我們深思，這是他這方面研究的另一個特色。首先是他以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的觀點。余杰是一位知識分子，應該說是公共知識分子。作為後者，他對時代有強烈的關懷與責任感。他要針對時代的問題說話，他是以這些問題為基點去回顧與檢討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因此，他很明白地說，他的歷史研究不是發自歷史的好奇心，關在象牙塔裡做的，而是發自他所謂的「現實關懷」，希望能與近代知識分子這個傳統的「先哲」對話，從他們的思想吸取教訓，從而認識知識分子對當今的時代問題，應採取的立場，以及應該走的道路。是從這樣一個觀點，他響應了義大利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的名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

借用時下學界的名詞，這種觀點可稱之為「效應史觀」。這種史觀最大的長處是認識到史學研究不可能做到19世紀德國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揭櫫的主流史學目標——全面客觀地去了解歷史真相。主觀意識不可避免地進入歷史研究，因為歷史了解受史家的問題意識支配，而問題意識則往往來自對時代環境的回應與感受，把這種主觀的時代意識與問題意識提出來加以認清，加以控制與提煉，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去作進一步的史料搜集與分析工作。我多年來很受這種史觀的影響。現在很高興發現在這方面我和余杰也有共識。

余杰回顧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傳統不僅是以效應史觀為出發點，而且主要著眼於思想的發展。我此處所謂的「思想」定義很寬泛。思想是指人對生命環境作有意識的回應。這個廣義的定義很適用於余杰此

書所指涉的思想。因為後者包含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意識。有些意識已很清楚地形成觀念。例如，他在討論譚嗣同思想中的宗教觀與批判意識以及他比較梁啟超、蘇曼殊與魯迅不同的「拜倫觀」時所作的一些觀念史的分析。但他書中探討的思想對象也有不屬於觀念層次的意識，但其中的感情與價值意向卻已隱然可見。例如他在討論魯迅與卡繆的生命意識與肺病的關係時，即時有這方面的探索。儘管余杰在書中處理了不同層次與類型的思想，他在知識分子的專題研究裡卻強調他研究的理想與目標是發掘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他稱這種探討為「心靈史」或「靈魂史」。這使我聯想到余英時多年前提出的「心史」觀念。這些觀念在時下實證思想仍然籠罩的學界裡也許會引起不少人皺眉頭，認為是不科學的虛妄之談。但在我看來，這些觀念卻是很有創意，很值得提出來加以推敲，加以開拓的。這裡無法深論，就讓我簡單地說明一下理由。

我們都知道思想史的一個主要對象是觀念的發展。提到觀念，大家很容易想到它的認知意涵：觀念是我們認知客觀對象的工具。但有些觀念不只具有認知意識，也帶有以情感與價值為取向的意識。當一個觀念或一組觀念同時含有認知與情感以及價值三種不同取向的意識，也即知、情、意三者揉合為一時，便形成一種精神層面上(或者精神性)的觀念。宗教思想中的終極關懷或者意識型態的核心信念往往主要是由這種精神性的觀念構成。我認為這種精神性的觀念就是上面提到的「心靈史」、「心史」或「靈魂史」的主要對象。因此我絲毫不覺得這些觀念是玄虛之談。今天要想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作深入的透視，當然應該重視這些精神層面上的意識與觀念，當然要談「心史」、「心靈史」！只可惜今天在思想史的領域中，這樣的著作還很少見。這也使我對余杰今後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抱有厚望！

張灝

序二

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思考

自1998年4月《火與冰》出版，余杰的名字即在中國讀書界不脛而走，其眾多雜文隨筆集也如急風暴雨，橫掃全國。以雜文而不是學術論文開始其研究生學習，在余杰既似乎是一個意外，又多少帶有必然性。而無論如何，第一本書的熱銷決定了余杰此後的人生走向，其學術興趣也必然隨之發生轉移。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余杰為錢理群的學生。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從學籍管理上說，他本來是我指導的碩士生。這樣的誤會確實有相當的道理，除了課堂內外的交流，在精神塑造的層面上，老錢（這是我們朋友圈私下對錢理群的稱呼）對余杰的影響無疑更大。二人對現實社會弊病的密切關注與尖銳揭發，可謂一脈相承。這樣說並非意味著老錢贊同余杰的所有觀點，我想強調的只是其間共同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在《火與冰》及緊隨其後的《鐵屋中的吶喊》裡，此一特質因其激烈的言說方式而成為余杰寫作的徽記。而這種社會批判的視野，顯然是以學院派自囿的我所欠缺的。

還在1997年夏，余杰大學畢業前夕，他在給我的一封信中，對其入讀研究生後的學習，曾有從晚明文學做起的考慮，雖然我的招生方向為中國近代文學。這顯示出，其時余杰尚有致力於學術研究、從長計議的打算。不過，閉門讀書顯然並非其志趣所在，已在抽屜中積有大量文稿、並已從中選輯自印出四冊的創作衝動，使余杰的眼光無法遏止地越過學院，投向社會。《火與冰》所引起的轟動效應，適時地

印證了余杰在學術研究之外極大的寫作潛力與社會認可度，由此也堅定了其放棄成為學者而更想做鬥士的人生選擇。

研究生三年，給了余杰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時間，也為他的社會批評提供了更為豐厚的知識土壤。我自信不是一個十分專斷的導師，也並不認為從事學術研究方成正果。我所希望於學生的是，能夠最大程度的發揮個人所長。因此，余杰在專業以外的發展，我是樂觀其成；只不過提醒他，切勿操之過急，每本書都應該更上一級。而在專業研究的範圍內，我還要求他中規中矩，甚至因為他的資質本來不錯，而有更高的期待。這也許對余杰造成了某種壓抑。在〈《知新報》研究·後記〉中，他曾提到：「三年來，我獲得讚揚的時候少，遭遇批評的時候多。」儘管他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表示這樣才使他能夠「不斷地發現自己的問題和弱點，在良好的學術訓練和濃郁的學術薰陶中成長」，我仍然明白，他確實沒有得到應有的、足夠的肯定。

現在，余杰把他自大學學年論文以來有關近現代文史的論作集為一編，其學術特色也因此一集中而得到彰顯。可以看得很清楚，其中最具有學院色彩的是下卷所收的〈《知新報》研究〉，這篇長文是余杰碩士學位論文的改訂稿。中卷以文本內部結構的討論為中心，大致一半寫於在學期間，一半作於畢業之後。上卷則專注於近現代知識分子思想的考察，多半是今年完成的新作。寫作時序與編排次序的相互顛倒頗有意味，它表明，即使在編輯學術文集時，余杰看重的仍是其間思想的分量。

這也使得余杰的論文集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論集，我們不能指望從中有很多新資料的發現與考辨(下卷例外)，甚至某些重要的論點亦非其原創，但思考的銳利與寫作的自由狀態，賦予其論說以內在的魅力與氣勢。這是許多寫了一輩子學術論文的研究者，從來不曾達到的境界。在這個意義上，余杰是成功的。

因此，我更願意用「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思考」來概括余杰論文
的特色。在〈從「士大夫」到「知識分子」〉一文中，余杰表示認同
這樣一種對「知識分子」的定義，即「『關心社會枯榮』乃是知識分
子與文人或專業人士之間的根本差異」。對現實社會人群生存狀態的
關心，應該是余杰入讀研究生後毅然捨棄晚明、直接從晚清入手的根
本原因。因為近代中國所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引發的
社會政治、思想文化的震盪，至今仍未消歇。討論晚清的話題，便很
容易延伸到當下。余杰讀書興趣的「向下走」，正是兼顧了學術研究
與社會批判的二重身分而作出的明智抉擇。這種出乎雜文、入乎論文
的文體轉換，也使得歷史與現實在余杰筆下少有隔膜。比如，以「論
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為副題的〈「秦制」：中國歷史
最大的秘密〉，以及正題為〈最是文人不自由〉的「論章學誠的『業
餘』文章」，儘管一論思想，一說文章，但即使從題目上也可分明見
出，其關切點始終在當代。

這種看重思想、指向當下的學術旨趣，也可以用來解釋余杰論文
寫作中的某些局限。透過注釋我們可以知道，余杰讀書相當廣博，但
顯然，他更重視的是那些思想含量豐厚的論著與作品，而並不在廣泛
搜集與考察對象相關的原始資料上花費太多精力。講論文本的思想內
涵時，他給我的印象是意興遄飛，不乏深刻與老練；而一旦論題轉向
藝術的剖析，則多少留下了若干不夠深入與稍嫌稚嫩的遺憾。這固然
與本書中卷的論文寫作時間相對較早有關，也是其文字往往從文學的
討論很快滑向思想的闡發的原因，余杰無疑在後一層面更覺遊刃有
餘。

本來，魚與熊掌便很難兼得。假如說以上的話太過苛求，那也仍
然是緣於我對余杰實在有太高的期望。

夏曉虹

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目次

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張灝序)	i
-----------------------	---

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思考(夏曉虹序)	ix
-------------------------	----

上卷 分水嶺前的思索

盜火者與殉難者	3
---------------	---

——論譚嗣同思想體系及生命實踐中的基督教因素

(一)西書、傳教士與教案	6
--------------------	---

(二)耶、孔、佛三教同一說	13
---------------------	----

(三)向死而生的烈士精神	19
--------------------	----

「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	25
----------------------	----

——論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

(一)政治傳統：「秦制」的核心是君權之神聖化	27
------------------------------	----

(二)文化傳統：「秦制」的學術淵源是「儒表法裡」	34
--------------------------------	----

(三)中國歷史的二元結構：「秦始皇」與「孟姜女」的對立	42
-----------------------------------	----

「拚卻名聲，以顧大局」	51
-------------------	----

——從曾紀澤與慈禧太后的對話看晚清改革開放與道德倫理之衝突

(一)最高統治者的西學知識	54
(二)士大夫參與外交事務所面臨的道德壓力	59
(三)外語教育的滯後與外交人才的匱乏	66
「清流」不清	75
——從《孽海花》看晚清之「清流政治」和「清流文化」	
從「士大夫」到「知識分子」	95
(一)「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緣起	95
(二)中國的士大夫傳統	104
(三)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產生與發展	115
中卷 文學內部的問題	
最是文人不自由	127
——論章學誠的「業餘」文章	
(一)「撰著於車塵馬足之間」——章學誠之生平	128
(二)「儒林內史」——章學誠傳記中的清代士人群像	133
(三)「毛」與「皮」之間的尷尬——從章學誠給畢沅的 兩封信看章氏對自由的追求	144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	153
——論劉鶚之《老殘遊記》	
(一)政治·寓言·讖緯	154
(二)史傳·酷吏·清官	160
(三)遊記·散文·小說	165
(四)舊情趣與新思維	171

何處蒼波問曼殊.....177

——略論蘇曼殊小說《碎簪記》中尷尬的敘述者

狂飆中的拜倫之歌.....203

——以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爲中心探討清末民初文人的
「拜倫觀」

(一)梁啟超：「民族」的個人.....205

(二)蘇曼殊：「浪漫」的個人.....214

(三)魯迅：「現代」的個人.....225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識.....237

——魯迅與卡繆之比較研究

(一)肉體與精神的疼痛.....240

(二)被隔離的「局外人」與回不去的「故鄉」.....249

(三)「肩住閘門」與「推石頭上山」.....259

下卷 《知新報》研究

提 要.....273

第一章 晚清報刊熱中的《知新報》.....275

第一節 晚清的報刊熱與《知新報》的創辦.....275

第二節 《知新報》的命名、發行與報頭變化.....293

第三節 《知新報》的報刊意識.....312

第四節 《知新報》的影響.....326

第二章 《知新報》的核心人物.....341

第一節 《知新報》的主要作者和譯者.....341

第二節 康有爲與《知新報》.....362